

学科综述

2016 年国际发展经济学综述

孙靓莹*

【内容提要】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内核是研究国际发展关系，包括如何在世界体系内构建国际发展体系。国际援助作为发展经济学科的分支之一，能够很好地反映发展理念自身的变迁，以及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执行。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回顾了2016年国际援助领域的文献：援助的动因、运作和效果。有关对外援助的动因，2016年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角度：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变化、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转变与具体案例、典型国家对外援助的动因。关于对外援助运作，主要包括中国对外援助机制、援助运行模式国别探讨、第三方援助机构参与援助的管理模式，以及促贸援助的应用与评价。对援助效果的探讨主要包括两部分：应用不同标准评估援助效果和通过援助改进受援国的政策。

【关键词】发展援助 一带一路 援助有效性 援助动因

一、引言

源于西方的现代发展研究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个专业的学科理论，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框架。然而，这套研究正受到各方的挑战。首先，在研究对象、分析假设和实证研究方面，发展研究并没有将自身同经典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分开来。其次，发展研究里的主流学科知识无法直接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强调的前提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这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结构化的制度变迁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维度考察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难形成标准理论和政策解决方案。

在新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除了传统的南北合作之外，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更多地出现在发展治理的领域视角中。发展模式上，以西方国家为样板进行的民主化、市场化国家改革不再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唯一样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为新兴国家提供了更多路径选择。国际发展经济学在三个层面上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全球层面上，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贸易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以及外交领域的新孤立主义成为新全球化的特点。在区域合作中，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例的区域新发展倡议不断涌现。在国家层面上，国家边界再次兴

* 孙靓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maggie036@aliyun.com。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并自负文责。

起,各国对各个维度发展目标追求逐渐“向内看”。上述实践都会投射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学术探讨之中。2016年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2016年世界银行召开发展经济学年会,会议主题为“数据与发展经济学”。随后出版的世界银行2016年发展报告也以《数字红利》为主题,指出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工商业、就业和服务提供方式。这些进步使得经济社会的领先群体更有生产力,尽管还有许多人未能从数字革命中丝毫受益。为了确保让所有人获得互联网红利,关注技术普及程度至关重要。此外,技术需要更完善的配套机制,而这些机制决定着企业、民众和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利用新数字工具。加强非数字基础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需要克服一些最为根深蒂固的发展挑战,如何营造企业可以壮大成长的环境,如何建立有效的教育培训体系,如何让服务提供者更有效回应民众所需。不进行必要改革的国家就会被数字革命抛在后面。而对于改革成功者,技术投资将带来丰厚的数字红利,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将从中受益。^①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发展理论的争论逐步呈现出某种所谓“共识”。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共同主导了这一新国际发展研究框架。在这个内核下,市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的国家机器为市场保驾护航,而这个有效的国家假设的基础是良好的治理机构。以发展理论为基础的对外援助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以“良治”(good governance)为代表的援助目标的设立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物。然而,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并没有让非洲走出贫困,而西方则一再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不符合西方模式的中国经济蓬勃增长,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为新援助理念、新发展理念培育了土壤。

以国际援助为例分析国际发展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国际层面上,援助出现了三方合作机制的新动向。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受援国三方合作机制、援助国授权第三方援助机构实施发展援助等不断涌现,对以世行和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多边机构援助实践的研究更为深入。在区域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合作机制使得学者们更为关注精准发展援助。在国家层面,向传统援助国学习发展援助经验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

新兴国家的崛起改变了援助理论中传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应关系,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这让发展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失去了分析基础。此外,传统发展问题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而新兴国家出现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引发了其他附带的严重问题,例如不平等加剧、社会保障缺失以及环境污染等。发展研究的焦点从贫困问题转移到不平等问题和社会转型问题,这也逐步成为发展援助重点。此外,新世纪以来,新的话语体系如“经济特区”、“渐进式改革”、“共同学习协同转型”开始出现,与传统西方“治理”和“制度”形成对比。综上,新的发展研究范式正在孕育之中,其核心是对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批判和对单一实践方案的否定。这些反思形成了“自由制度的多元主义”。

2016年国际援助方面有关的研究共有73篇核心论文,其中对外援助动因的研究文献23篇,援助运作研究32篇,有关援助效果的文献18篇。其中在援助动因方面,有关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变化对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启示文献7篇,中国对外援助具体动因文献3篇,其他国家13篇(其中美国6篇,日本4篇,其他国家3篇)。在对外援助运作模式的探讨上,包

^① 世界银行:《201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50951467993193548/pdf/102724-WDR-WDR2016Overview-CHINESE-WebResBox-394840B-OUO-9.pdf>

括了中国对外援助机制、援助运行模式国别探讨、第三方援助机构管理以及促贸援助四个方面,分别发表文献4篇、14篇、12篇和2篇。在外援助效果评估方面,包括不同评价标准上的援助效果评估文献14篇和促进受援国政策改进文献4篇。

二、援助的动因

有关援助动因的研究以中文文献为主,研究角度主要有三个: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变化及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转变;中国对外援助动因的具体案例分析;典型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和国家援助动因的探讨。

(一)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变化及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

中国学者从整体国际形势的变化入手,分析了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变化,对中国在外因变化下的对外调整进行分析。总体看,二战结束后以美国“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为代表的近现代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已经延续了超过70年,并发生显著变化(胡勇,2016)。在此期间,国际发展援助的主体从以美国独大的单一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受援国从二战后的欧洲国家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援助的治理结构从“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逐步转向南南发展范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传统受援国开始成为新兴援助主体。发展援助从经济增长目标导向转移为社会发展目标,国际发展议题由西方主导逐渐变为南北共同商议等(唐丽霞,2016)。21世纪以来的国际发展援助格局的两个较为突出特点是对“援助有效性”的集体反思和新型发展援助主体的崛起(于浩森,2016)。

胡勇(2017)^①认为新兴发展援助体以“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援助方式直接挑战了西方以“治理”或“干预式”援助为中心的援助体系。南北合作以援助方案为主要载体,南南合作更强调发展伙伴关系。在性质与目的上,南北合作的主要平台是官方发展援助,南南合作则强调互利与增长。此外,在优先领域方面,社会领域的捐款与预算支持是南北合作的重点。而在南南合作中,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投资领域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则成为优先领域。相比较南南合作,NGO在南北合作中的作用更大,私人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则相对有限。

Ali et al. (2016)^②回顾了对外援助的起源与发展,认为对外援助的正式化和制度化还是在二战以后。论文详细分析了援助的不同动机与目标。作者认为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援助不断演化,进而成为追求包括经济增长、改善和建设基础设施、在欠发达国家减少绝对贫困的手段。在国际援助发展的新趋势中,一个新的援助范式是将减贫作为发展的最重要目标,其中的重点在于国际发展目标(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argets, IDTs)的规划和实现。

刘方平(2016)^③从中国发展和参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视角来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援助理念从国际主义转向平

① 胡勇(2016):“国际发展援助转型与印度对非发展合作”,《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第6期,第131-156页。

② Ali, M. & Zeb, A. (2016). Foreign Aid: Origin, Evolu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dialogue*, Volume XI, 1, 107-125.

③ 刘方平(2016):“‘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东南亚援助”,《国际展望》,第8期,第70-89页。

等互利；2. 战略目标由政治目标转向发展目标；3. 援助实践也超越了援助对象的意识形态。因此，在援助的动因领域的探讨中，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探讨也成为学者探讨的重点。“动因—关系”解释机制成为中国对外援助构建的理论框架之一。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中国发展对外援助的主要动因是基于伙伴国关系确立后的政治目标、人道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行为。在关系维度上，中国与援助国关系、援外行为与国内环境和援外行为与国际环境这三组关系是主要决定因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崛起中的大国这三种相互联系的国家身份最终决定了中国在对外援助时所呈现出的国家特色。中国对外援助从“援助”与“合作”两个角度出发，有助于改善国际经济体系，改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此外，任晓（2016）^①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代市场力量和对援助体系是共同影响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输出方面，对外援助作为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质，既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资金，也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组成部分，使国际社会各方受益。姜默竹（2016）^②分析对外援助的“中国模式”符合以下三种特点：它既是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平等型援助”，也是以弘义融利为主的“互惠型援助”，同时也是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增益型援助”。自1950年开启对外援助以来，援助理念从信念伦理（1949—1977年）到责任伦理（1978—2004年）并逐步迈向关怀伦理（2005年至今）。在援助方式上，从改革开放前单纯地提供援助转变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胡鞍钢（2016）^③指出，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援助高速发展，对外援助金额已经达到世界高增长国家水平，对外援助额增速超过同期名义GDP增速，占世界比重不断上升，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在对外援助规模上看，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第四大对外援助国。

围绕中国对外援助出发点与落脚点，张敏（2016）^④回顾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发展援助所做的研究，具体从中国发展援助的动因、援助制度与体系、统计数据、基本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在该文中，外国学者对援助动因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早期。综合外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动因是通过与亚洲邻国的援助与合作争取更多话语权和领导权，包括摆脱对苏联的依赖。70年代中国开展对外援助是外交政策的工具之一，对中国和与中国竞争的其他援助国以及受援国都十分重要。

（二）中国对外援助动因的案例分析

除了对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整体性动因分析外，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对不同受援国开展援助工作的具体国别动因，这也体现出中国对外援助动因的分析走向了更为微观和具体的视野。这些分析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进行分析。

① 任晓、郭小琴（2016）：“解析中国对外援助：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55—165页。

② 姜默竹、李俊久（2016）：“朋友与利益——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援助”，《东北亚论坛》，第5期，第40—49页。

③ 胡鞍钢、张君忆、高宇宁（2016）：“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3期，第5—13页。

④ 张敏、刘长敏（2016）：“国外对中国发展援助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2期，第199—207页。

中国对非援助。蒋华杰(2016)^①认为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台湾在非洲的相互竞争,使得对外援助成为中国推动革命外交的外交工具,中国对非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推动非洲中左派力量形成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此外,以援助为手段展示和传授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进一步引导非洲国家走中国道路。从中国援非的经验可以看出,革命外交方针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是中国最终选择全面援非的重要原因。

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援助。刘方平该(2016)^②从“一带一路”倡议的视角考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援助,并且总结援助的三个阶段:增长、调整和发展。中国援助在维护国家利益并推动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所谓“援助边际收益递减”、地区效果不均衡的问题。

中国对阿富汗援助。何杰(2016)^③分析认为,中国对阿富汗援助开始于1963年,主要以人道主义援助为主。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之后的阿富汗内战期间,中国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几乎停滞。2001年阿富汗成立临时政府,中国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才重新开始恢复,并迅速增长。从动因看,阿富汗的重要意义超越了中阿关系和中美关系,更多关系到中国的地区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阿富汗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被称为中亚、南亚和西亚的“锁钥”,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阿富汗在中国维护西部边疆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阿富汗对中国是最大的资源。此外,双边经贸交流也日趋活跃,加强了双边联系纽带。最后,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工程和提供的援助有利于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 典型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探讨。

中外学者对援助动因的探索扩展到了国际视角。“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强了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手段变得更加重要。研究分析世界主要大国和组织在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对外援助实践,特别是援助动因,成为2016年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方面。

1. 美国

朱恒远(2016)^④分析了新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他指出,冷战时起,美国已经开始将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作为巩固和检验同盟国或友好国的试金石,这一合作在“9·11事件”后随着非传统威胁的涌现而逐步加强。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该计划的具体目标与现实考量,指出确立优先目标是开展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的前提,达成共同的安全观是开展合作的助力,客观评估影响力是开展合作的保证,设定附加条件是开展合作的补充。

徐建华(2016)^⑤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援助政策进行了分析。艾森豪

① 蒋华杰(2016):“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社会科学文摘》,第12期,第81-108页。

② 刘方平(2016):“‘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东南亚援助”,《国际展望》,第8期,第70-89页。

③ 何杰(2016):“中国对阿富汗援助初探”,《国际研究参考》,第3期,第1-4页。

④ 朱恒远(2016):“新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国际研究参考》,第7期,第8-11页。

⑤ 徐建华(2016):“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援助政策评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第104-111页。

威尔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重点转移向亚洲地区,在全面战争风险减少、避免直接军事介入的前提下,美国通过经济、政治手段对抗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政策性工具是对外援助,主要对象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其后也包括一些中立国家。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援助优先于经济援助,这使美国获得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稳定,稳定美国的原材料供应。此外,徐建华(2016)^①分析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对缅甸援助的政策。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缅甸成为美国在中南半岛地区的战略支点,变革中的缅甸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奥巴马政府对缅甸政策由孤立、制裁逐步转移为接触、援助的政策。美国既通过选举援助、政党援助、培育公民社会等民主援助方式介入缅甸政治、社会变革,又通过专项经济援助帮助缅甸经济发展,为后续政治改革提供动力。在未来时期,援助与制裁交替的政策将成为美国干预缅甸的重要手段。张帆(2016)^②分析了“茉莉花革命”以来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情况。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后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促进民主”、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样板国家。近年来,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规模上升迅速,援助以双边或多边方式迅速推行,安全援助在美国对突尼斯援助中占有较大份额。美国对突尼斯援助的顺利进行与下述原因有关:美国国会与美国既有的中东援助体系的支持,“安全第一”成为美国援助突尼斯的重要特征之一。

Gries(2016)^③研究了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对拉丁美洲的援助态度。研究认为,美国保守派对拉丁美洲的态度比自由派更冷淡,他们对美国墨西哥边界政策与对外援助的态度更强硬。具体分析看,自由派和经济保守派反对向海地等国家提供援助,这主要源于清教徒的自助伦理道德和反对收入再分配的信仰。社群主义者和经济自由主义者更支持对海地的援助。文化保守派担心墨西哥移民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偏好将持续地分裂着美国对拉美的政策选择。Chilton(2016)^④研究了美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动机,并指出美国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更多地是考虑到军事援助因素或者该国是否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而并非出于经济因素或投资需求。

Wang(2016)^⑤研究了美国对外援助分配的讨价还价模型,来解释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总额在不同受援国中的分配。人均收入更高、国内存在内战、存在违反人权的情况和体制更民主的受援国将获得更多的对外援助。而从美国进口越多、与美国签有防务条约的受援国,其对援助金额的议价能力能弱。

2. 日本

日本对外援助的研究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力。日本在对外援助领域的实践对中国有值得借鉴的参考意义,同时也有助于透过日本对外援助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外交政策动向。

① 徐建华(2016):“奥巴马政府对缅甸援助政策析评”,《国际论坛》,第5期,第27-31页。

② 张帆(2016):“试析‘茉莉花革命’以来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美国研究》,第1期,第52-69页。

③ Gries, P. H. (2016). Liberals and Latin America: How Ideology Divides Americans Over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Aid.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51 (3), 23-46.

④ Chilton, A. S. (2016). The Political Motiv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Bilaterally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4), 614-642.

⑤ Wang, Y. (2016). The Effect of Bargaining on US Economic Ai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2 (3), 479-502.

戴永红 (2016)^① 分析了 2010 年以来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新趋势及制约因素。自 2010 年缅甸开始民主改革以来,日本开始日益重视对缅甸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意图将其纳入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上来,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政治上更注重政策沟通和机制建设,经济上更重视基础设施和行业标准设立,社会民生上更重视灾害管理和人道救援。同时,对缅官方发展援助也受到日本经济发展低迷、中缅历史与现实联系和缅甸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制约。

王箫轲 (2016)^② 分析了“积极和平主义”下日本对外发展援助的影响。日本对外援助呈现出由“经济开发型”向“战略支持型”的转变,更注重援助项目对日本外交、安保的支持效应。在援助领域日本解除了对支援他国军队的限制,也可以支援发展中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安倍政府调整对外援助政策扩大了政府发展援助的战略功能,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对中国而言,日本针对性更强的官方发展援助带来了周边外交的复杂程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广的竞争增压力。作者建议中国应建立亲疏远近的外交观,构建援助—投资范例并适度扩大军事援助来平衡日本此轮对外援助的扩张。

刘艳分析了日本战后援助政策的演变,指出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但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外交利益始终是日本对外援助的目标。崔岩 (2016)^③ 分析亚洲开发合作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在相当长时期都将表现为不断加强的竞争关系。区域合作中蕴含的重大国家利益、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直接折射到双方竞争关系中。中日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双方对亚战略背离是导致双方竞争关系的决定因素,而对亚洲开发合作模式、合作区域及合作领域的趋同导致具体领域竞争加剧。

3. 其他国家

对于欧盟如何通过发展援助宣传民主、人权与良治,受援国如何在接受援助的同时面对政治改革的压力这一问题,刘青建 (2016)^④ 撰文详细阐述了这其中的互动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开始转向以民主、人权和良治为政治导向。加纳政府在接受欧盟发展援助中,始终以自身国情为基础,用灵活方式使用发展援助资金。带有政治导向的欧盟发展援助对加纳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双重作用。加纳在接受上述发展援助时,从国家利益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以灵活方式将欧盟要求与国家自身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相结合,实现与欧盟的良性互动,并牢牢掌握国家发展的主动权。加纳发展离不开欧盟援助,但根本原因仍在于自身能动性的发挥。

张帆 (2016)^⑤ 分析了海湾君主国家对中东地区进行对外援助的深层次原因及变化情况。海湾君主国的对外援助活动开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其主要原因在于推动“南南合作”、

① 戴永红、曾凯 (2016):“2010 年以来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新特点及其制约性因素”,《日本研究》,第 3 期,第 42-48 页。

② 王箫轲 (2016):“‘积极和平主义’背景下日本 ODA 政策的调整与影响”,《东北亚论坛》,第 4 期,第 36-48 页。

③ 刘艳 (2016):“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政策演变及战略分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0 期,第 87-93 页。

④ 刘青建、赵雅婷 (2016):“欧盟发展援助与加纳民主政治发展探析”,《国际论坛》,第 2 期,第 20-26 页。

⑤ 张帆 (2016):“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发展变化”,《西亚非洲》,第 1 期,第 145-160 页。

加强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协作。随着时间推移,中东地区的地区局势日益发展变化,海湾君主国的对外援助更多是为了应对以下两方面挑战:频繁爆发的地区危机和扩大自身的地区影响力。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化引发西亚北非地区的剧烈地缘政治冲突,在此背景下,海湾君主国以对外援助为手段,结合外交、军事干预等方式,进一步维护了自身政权稳定,扩大自身影响力。除此之外,其援助对象也逐步扩展到包括叙利亚反对派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分析印度对非洲援助中,龚伟(2016)^①指出,重塑政治大国的优势地位与形象、获取自然资源、开拓市场和扩大贸易、应对印度在非洲移民利益、扩大同其他新兴大国竞争力在非影响力都是印度扩大在非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三、援助的运作机制

(一) 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的探讨

近年来对中国顶层援助管理制度的探讨,学者们开始逐渐形成共识:中国应尽快出台《对外援助法》,理顺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加强对外援助绩效评估,通过制度完善提升援助效果与效率。中国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对外援助机构。在具体机构的设置上,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建议。赵裴(2016)^②认为,应成立由商务部作为主任单位,外交部和财政部作为副主任单位的三部委领衔机制,30个中央部委和单位组成“对外援助部际联系机制”。胡鞍钢则认为应成立以外交部牵头的国务院直属发展援助机构。

赵裴将对外援助体制分成如下三种类型。(1)独立机构负责型援助体制,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墨西哥为主。(2)多部门协调型援助体制,以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欧盟、意大利和韩国为主。(3)非政府化援助体制,主要以德国、南非、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为主。

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对非援助的具体方式和途径。秦路(2016)^③对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成效、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任洪波则从对非科技援助的方面入手,提出借鉴国际经验、选择以南非为支点对非进行科技援助。以援助促进中非产能合作的问题上,王涿(2016)^④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明确重点国家、加大精准投入和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内优势产业,确定优先支持领域等。高宇祥(2016)^⑤分析了中国对智利援助模式的转变。中国援助智利的方式随着中国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中国对智利的援助模式从最初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援助逐步转向以技术为主的国际发展援助,这为中国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提供了经验。

① 龚伟(2016):“印度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政策”,《南亚研究季刊》,第2期,第66-75页。

② 赵裴(2016):“援助外交体制研究及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未来改革的可能选择”,《国际论坛》,第1期,第53-58页。

③ 秦路、楼一平(2016):“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成效、问题和政策建议”,《国际经济合作》,第8期,第49-54页。

④ 王涿(2016):“对非援助促进中非产能合作的目标、原则及政策建议”,《国际贸易》,第12期,第23-25页。

⑤ 高宇祥(2016):“中国援助智利模式的转型及其启示”,《中国国情国力》,第3期,第72-75页。

（二）援助运作模式的国别探讨

此外，学界对援助运作模式的分析也越来越多，并且在一般性理论框架分析的基础上开始向不同国家的具体运作案例分析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以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主，既包括中国对不同受援对象的援助方式的分析，也包括其他援助国对外援助方式的探讨。

1. 美国

Dichter (2016)^① 分析了美国发展援助遭遇停滞的原因，并建议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美国对外援助署应更多与当地组织合作，理解受援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非常重要，同时也应注意受援国当地的官僚体制约束。刘艳 (2016)^② 指出，美国在二战之后通过大规模实施“马歇尔计划”将欧洲纳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此后，美国通过立法形式在 1948 年通过《经济合作法》加以固定。《经济合作法》明确了美国推进“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参与国家、实施原则和援助方式，对参与国接收援助的条件用授权性和禁止性条款加以约束，用规则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中国目前正在推出“一带一路”建设，对此，刘艳分析了中国新时期的全球化战略，对比美国的经验与做法，建议设定一步综合立法如《对外经济合作法》，将审批监管、金融促进与支持、信息技术服务、风险控制这四个重要领域的关键内容通过立法进行确认，用法治的方法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

罗会钧 (2016)^③ 分析了美国对非发展援助的经验与教训，指出，对外援助的法制化、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配合、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的共同作用以及对非援助信息的公开透明化是主要成功经验。而对美国援助非洲的批评和质疑主要来自于对非援助的条件性，以及受援国没有权利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和调整发展援助资金的使用。对此，中国应完善对外援助相关法律、设立专门对外发展援助机构、增加发展援助信息透明度以及重视多边援助。

Filpi et al (2016)^④ 分析了美国对外援助系统，并指出未来美国对外援助的发展中，问责制将成为重要方面。在考察援助效果各个维度中，Filpi 回顾了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数指标，世界司法项目 (WJP) 的法治指标，并建议未来美国国会加强对对外援助的监管与审查。

2. 日本

有关日本对外援助运作体制的研究包括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变迁、日本对外援助中的地区性援助政策和具体援助方式等。汤伊心 (2016)^⑤ 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建立了新的经济贸易体制，为走向援助大国、贸易强国打下了基础。日本与东南亚的新经济贸易体制特征是三位一体的“束缚性的政府援助、出口信贷和直接投资”。在经济界

① Dichter, T. (2016). Why USAID's New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s Stalled.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93 (10).

② 刘艳 (2016): “美国《经济合作法》及对中国海外经济立法的启示”, 《亚太经济》, 第 1 期, 第 70-74 页。

③ 罗会钧、黄梦佳 (2016): “美国对非发展援助的经验与教训——兼谈中国对外发展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第 3 期, 第 75-79 页。

④ Filpi, J. & Murry, L. (2016). United States Foreign Assistance: Beyond Good Intentions and Toward Accountability.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22 (3), 503-513.

⑤ 汤伊心 (2016): “试论战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形成与财界的作用”,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8 期, 第 156-161 页。

的推动下,对外融资、技术合作机构也得以设立。日本的财界在对外援助体制中发挥了替代、补充政府的作用,这也为日本财界势力日后拓展经济影响力奠定基础。

王月(2016)^①分析了日本对中亚五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具体战略。日本的中亚战略具有以下特点:援助重点国家随情况调整,主动迎合五国需求并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此外,日本采取实地调研、技术输出、以点带面以及强调环保和企业等方法确保该战略的充分实施。周源介绍了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手段,包括用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日元贷款、种类多样的无偿资金援助以及“看得到日本人”的技术合作。从客观效果来看,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预算削减压力以及中亚五国并非日本外交战略的中心,对上述地区的援助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日本在中亚经济活动规模不大、投入有限,对中亚援助物资脱离实际需要,没有做到物尽其用。

张继业(2016)^②分析了安倍政府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援助战略。日本在这一战略目标上,以开发援助推动区域发展稳定为基础,试图拉近与区域国家关系,增强日本实力与影响力,从而在经济上牟利、政治上促变、地缘上谋事势。从推进开发援助的路径上,主要重视推进区域经济融合以及打造援助重点国家,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受援国国家能力建设,支持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支持人文交流,与各利益相关方加强协作以及积极与中国竞争。该战略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中国应有针对性地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提高自身软实力,对湄公河国家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走“中间带动两翼”的路径,以泰国、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为牵引,加强与印度沟通,积极推动“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

德国和日本将对外援助资金与商业性资金相结合促进国家战略实施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具有代表性。许豫东(2016)^③认为日本对外援助主要通过外务省和国际协力机构(JICA)展开,可供借鉴的经验包括官商联手行动支持日本企业在亚洲地区开展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依托国际组织推动政策性资金与商业资金参与援助项目,通过援助引导社会多方参与。

对外援助中的政府贷款是重要部分,黄梅波(2016)^④分析了日元贷款中可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和企业“走出去”战略借鉴的经验,包括JICA对海外中小企业扩张的支持并梳理了日本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支持日本企业海外扩张的流程图。相对于日元贷款,中国政府贷款及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推进仍处于直接和初级阶段,相应配套政策不足,政府优惠贷款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作用有限。对此,中国可以适度借鉴日本贷款援助机制和经验。

3. 欧盟及其他国家

对于欧盟在对外援助的实践也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对欧盟及德国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其较为先进的对外援助方法与地区侧重点上。德国目前拥有世界规模最大、专业性最

① 王月、李新英(2016):“从政府开发援助分析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战略特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第5期,第67-83页。

② 张继业、钮菊生(2016):“试析安倍政府的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援助战略”,《现代国际关系》,第3期,第31-39页。

③ 许豫东、吴迪、甄选(2016):“日德对外援助资金与社会资金相结合的经验及启示”,《国际经济合作》,第8期,第45-48页。

④ 黄梅波、张博文(2016):“政府贷款与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经验及启示”,《亚太经济》,第6期,第85-91页。

强的国际发展援助力量，同时德国的项目运作经验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世界性标杆。唐丽霞(2016)^①分析了德国农业援助的战略、机构设置和途径。具体来看德国农业对外援助的如下特点。(1)援助战略一致性和多部门参与相统一。(2)以农业技术咨询公司执行援助项目，既保证公司化运作方式，又保证援助成本收益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对外援助项目的公益性和公共性。(3)重视与受援国本土机构合作。(4)项目文件的设计、出版和宣传展示。

李超(2016)^②总结了欧盟对外医疗援助实践。欧盟已经逐渐发展起“事前预警、全面覆盖、协调合作”的独特机制，虽然经历了经济金融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欧盟在医疗救援方面的支出并未缩减。欧盟人道主义援助预算不断提升，已接近欧盟总预算的1%。欧盟以医疗援助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有三点可供中国借鉴。第一，开展对外医疗援助是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第二，对外医疗援助可以同步传播价值观，欧盟一直标榜自己“人道”与“人权”标杆，在打造“人权卫士”形象的同时输出西方价值观。中国在开展对外医疗援助时，也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传统美德。第三，对外医疗援助可以配合外交决策进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中国可以考虑将医疗援助工作上升到战略层面统筹安排，作为彰显和经营中国海外关系的重要手段，争取受援国在重大战略利益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

冯存万(2016)^③梳理了欧盟气候援助政策的演进、构建和趋势。气候援助是国际气候谈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并适应气候变化。欧盟是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气候融资提供方，对国际气候援助有关键性影响。其外交目标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及能力建设，重视发展联盟关系并通过多元化途径强调技术合作。从气候援助未来发展趋势看，主要缔约方将会施压以求分担责任，进一步减少公共财政比例，重视项目评估与监督。

龚伟(2016)^④分析了印度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政策。本世纪以来，印度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力度逐步增强，印度扩大对非发展援助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全球大国形象、获取能源和开拓市场、扩大贸易、维护在非印度移民利益以及与新兴大国竞争在非洲的影响力。印度对非洲援助对象和主要援助领域的选择极具深意：在援助领域上，主要以经济、技术援助为主；以信贷、投资等金融援助为重点，着眼于教育文化援助，逐步增加多边援助的比重。在援助手段上，印度更多地利用如培训、专家咨询、分享发展经验与技术成果等“柔性”方式。从印度国内看，民众支持、资金限制与行政效率低下以及如何平衡功利性与道义的关系都成为印度对非援助中的重要挑战。

还有学者回顾了对外发展援助的管理制度变革。黄梅波(2016)^⑤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目标和管理体制受到世界经济与对外援助领域格局的变化。其对外援助战略目标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从帮助推进受援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为减少贫困与维护地区

① 唐丽霞、武晋(2016)：“德国农业援助：战略、机构设置和途径”，《德国研究》，第2期，第103-115页。

② 李超(2016)：“欧盟对外医疗援助”，《国际研究参考》，第4期，第8-12页。

③ 冯存万、乍得·丹莫洛(2016)：“欧盟气候援助政策：演进、构建及趋势”，《欧洲研究》，第2期，第36-51页。

④ 龚伟(2016)：“印度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政策”，《南亚研究季刊》，第2期，第66-75页。

⑤ 黄梅波、沈婧(2016)：“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政策改革及其借鉴意义”，《国际经济合作》，第8期，第39-44页。

稳定,进而发展成为促进繁荣、减少贫困与加强稳定。2014年澳大利亚新出台的对外援助政策将重点放在促贸援助与基础设施建设上,重点关注接受援助国家的政策、制度和经济运作的有效治理,其援助的地区焦点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三) 有第三方援助机构参与的援助管理模式

在对外援助过程中,除了双边对外援助外,对外援助中的多边合作逐步凸显,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经验。对外援助三方合作是联系传统援助国、新兴援助国和受援过的新方式。巴西是目前开展三方合作项目最早和最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非洲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是巴西三方合作项目最集中的地区,日本和德国是巴西最主要的三方合作伙伴国家。从数量上来看,三方合作目前占巴西所有技术援助项目的五分之一。通过对比分析,郭语(2016)^①认为,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逐步拓展合作伙伴和方式,在优势领域持续谨慎地开展三方合作。郭语(2016)^②分析了德国对外援助的三方合作管理问题。德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第四大援助国,是三方合作的最主要参与者与探索者。德国开展三方合作的诉求在于构建与新兴国家,特别是德国已经停止援助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德国三方合作项目最集中地区是拉丁美洲,最主要合作伙伴国家是巴西和南非。

Kim(2016)^③分析了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特别在对外援助政策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具体活动。非政府组织直接影响援助国对受援国的援助政策,扮演着信息提供者和游说集团的角色。通过对国际发展领域的理论论证,分析了美国非政府组织之于该国对外援助决策的影响。这项研究表明,随着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实地业务的增加,该国更有可能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援助。在发展中国家运营时间较长的非政府组织也能更有效地游说美国提供更多的外援。

随着对外援助中的非政府参与者增多,学术界建立了不同的理论模型对此进行解释。McKeown(2016)^④运用外交政策中的双层博弈理论探讨了外交政策官员个人人际网络与协调政策创新的关系,他指出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联系也将对对外援助分配产生影响。与双层博弈中,一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谈判总是会受到该国政府国内约束的限制。与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博弈相类似,这些组织中的官员也面临着个人跨国网络和在援助国组织中正式官职的双层博弈,两者相互加强——非正式场合的理解促进了正式协议签署,官员所在组织采取的行动将私下谈判内容进一步固定下来。McKeown通过检验非正式跨国网络的作用,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印度及其他主要援助国政府的政策变迁。

在对外援助的提供和组织协调中,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不容忽视。国内外学者对发展援

① 郭语(2016):“巴西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管理与实践”,《拉丁美洲研究》,第6期,第20-33页。

② 郭语(2016):“德国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管理与实践”《国际经济合作》,第5期,第53-57页。

③ Kim, Y. (2016). How NGOs Influence US Foreign Aid Alloca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3 (1), 112-132.

④ McKeown, T. J. (2016). A different two-level game: foreign policy officials' personal networks and coordinated policy innov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1), 93-122.

助中世界银行的作用也进行了重点分析。Yackee (2016)^①指出,一些著名的社会、法律学者经常批评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项目”,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发展援助的援助国很不恰当地把是否遵守“营商规则”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通过实证研究,Yackee分析了发展援助近十年数据,考察是否“营商规则改革”做得好的发展中国家会得到更多发展援助,其研究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这一假设,即改革的力度越大,来自多边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援助金额会提高,但是总援助水平以及来自富裕国家的援助水平没有变化。

政府如何在各个国际发展机构中分配对外援助资源。Schneider (2016)^②分析了资源分配组合的相似性与国际发展援助,研究结果认为政府在各个国际发展机构的分配选择前提是最小化代理成本,并实现自身的对外援助政策。政府将稀有援助资源交给国际发展组织使其发展援助政策与该国外发展利益相符合。作者选用了1978年到2008年22个OCED国家对12个国际发展机构的援助金额(financial contributions)进行了验证,政府会定期给很多国际发展组织捐助,各国更倾向于将资源给予符合自己外交目标和投资组合意愿的国际发展机构。目前国际组织体系机构和援助设置日渐丰富,这让主权国家拥有更多选择,降低代理成本。

Fisher (2016)^③分析了中国与新开发银行的关系,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代表了援助的新方向。新开发银行纠正了IMF与世界银行条件性贷款。IMF与世界银行的贷款,通常要求改进治理水平、紧缩性政策以及开放市场,而金砖国家认为这是造成有些国家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中国对外援助的三个特点:不附加经济或政治条件;受援国通常用对外援助中的贷款通常用来购买中国的出口产品,这对中国及受援国是互惠的;2014年起中国商务部陆续公布对外援助管理措施包括各种反腐败法律法规,确保对外援助项目的廉洁。此外,金砖五国在进行对外援助过程中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其中不附加条件的优惠贷款是共同的主线。

Clemens et al. (2016)^④认为世行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减少绝对贫困,而作为其初期目标的纠正资本市场失灵只是一个附带目标。世行建议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多部门剧烈改革,以保证经济增长或促进公平,而这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并无助于减贫。Clemens认为未来世行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资本投资,而是应将一系列活动和工具考虑进来。单纯用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因变量,将援助的提供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方式将带来误导性的后果。

支持海外市民社会促进民主是美国主要战略之一。研究显示,美国主要将资金投入给美国的海外非政府组织,推动当地转型期和非民主国家,而不是所在国本地的非政府组织。但是援助国官员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依赖程度根据受援国不同有很大差异。为什么在某些国家美国援助政策官员更依赖美国海外非政府组织,Bush (2016)^⑤的研究认为,与其他非美国非政府组织相比,美国非政府组织更认同美国政府立场。对援助官员来说,这更容易在对美

① Yackee, J. W. (2016). Foreign Aid, Law Reform, and the World Bank's Doing Business Project. *Law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 (1), 177 - 199.

② Schneider, C. J. (2016). Portfolio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0, 647 - 664.

③ Fisher, T. (2016). China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The Future of Foreign Aid?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8, 141 - 168.

④ Clemens, M. A. & Kremer, M. (2016). The New Role for the World Bank.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0 (1), 53 - 76.

⑤ Bush, S. S. (2016). When and why is civil society support “made-in-America”? Delegation to non-state actors in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1 - 385.

国外交政策重要的国家推行“美国产”民主政策。美国最近的民主援助项目数据证实了作者观点。这对于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对外援助有效性和世界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非常有用。

在多边开发银行业务中,技术援助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杨署东(2016)^①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对技术援助条款的阐述反映出亚投行在实施技术援助业务范围上的特殊性、针对性和限制性。说明亚投行在技术援助的“条件性”和“有效性”上有了重大改善。目前整个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更对技术援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相对技术先进国家对技术援助的需求更集中于政策研究、能源规划和环境改善等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侧重具体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国家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如何实现亚洲地区援助国与受援国在技术援助领域的“无缝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其中的先锋。亚投行将进一步完善技术援助系统机制,保障相关业务顺利进行。

徐佳君(2016)^②回顾了世行对中国援助的历程,分析了世行援助在中国扶贫领域的制度变迁。这一合作呈现出“长期对峙—短期冲突—短期协作—长效合作”的过程,其中长期对峙和短期冲突均不利于制度变迁的发生,相对于短期协作,长效合作的援助关系更有助于制度的本土化创新。有效的制度变迁并非制度移植,而是制度本土化的创新。

除了通过第三方机构提供援助外,援助提供还出现了“按结果付费”的方式。无论是英国的国际开发署,还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银行等都不同程度地选用了“按结果付费”方式,这其实是从前条件性援助的延续。“按结果付费”是可以广泛推广的做法吗?Clist(2016)^③的研究发现,这种方法在很多传统援助方式上的应用很小,如果应用过于广泛,很多要求或标准都会带来“误导”。该方法成功实施的前提有三个。(1)清楚、可界定、可持续测量的目标设定。(2)受援国应有参与或影响目标制定的渠道,至少不能被付款安排过度影响。(3)援助国应有在合理期间内起草和执行合同的能力。上述标准并非普遍适用或者“按结果付费”成功实施的保障,但它们涵盖了该方式可持续应用的重要特性。

(四) 促贸援助作为援助模式的应用与评价

促贸援助研究2016年的热度相对下降。严双伍(2016)^④对促贸援助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并给出了政策建议。中国应适度扩大促贸援助规模、通过自贸区建设推进促贸工作,重视并加大对非洲、加勒比地区援助。对促贸援助资金成立专门银行获基金管理,做好资金监控与评估工作,建立保障激励机制发展公私部门合作模式等建议。

黄梅波(2016)^⑤认为贸易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

① 杨署东、孟子群(2016):“亚投行技术援助机制的构建探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8期,第80-86页。

② 徐佳君(2016):“世界银行援助与中国减贫制度的变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第184-192页。

③ Clist, P. (2016). Payment by Results in Development Aid: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31 (2), 290-313.

④ 严双伍、唐鹏镛(2016):“促贸援助: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长江论坛》,第3期,第49-55页。

⑤ 黄梅波、陈冰林(2016):“促贸援助与SDGs:中国的角色与定位”,《国际贸易》,第2期,第24-30页。

展中国家更关注促贸援助中“结果”的有效性，坚持发展“有效性”。中国国际援助以政府优惠贷款为主，占总援助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中国提供援助的部门主要是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部门，其次是生产部门。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非洲是援助的重点地区。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问题更具有针对性，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这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在促贸援助中的重要地位。

四、援助有效性研究

（一）不同评价标准上援助效果的评估

对外援助有效性问题在过去30年中已被广泛研究，实证研究并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援助对于收入增长的影响方面，过去论文大多建立在线性增长模型基础之上，而各项研究的结果也差异巨大——对外援助给一国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负面的甚至是会依据不同变量发生变化。近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开始向对外援助对收入水平的非线性影响方面发展。Larsen (2016)^① 在放松增长模型线性假设之后，采用多元自适应回归样条法 (MARS)，运用官方发展援助 (ODA) 1985 年到 2014 年 72 个国家的跨部门数据检验了对外援助与收入水平的相关关系，发现对外援助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在初始门槛水平上，只有当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超过 4.6%，或者超过人均 24.97 美元的情况下，才会对收入水平起到推动作用。或者只有当对外援助规模足够大时，才会显著地提高受援国的收入水平。根据 Larsen 的研究，如果一国寻求收入水平的上升，那么该国应找到尽可能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从援助国角度来看，受援国最好达到一定收入水平，援助才会有效果。

熊青龙 (2016)^② 从动态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出发，从家庭、企业微观基础角度探讨了国际援助对援助国以及受援国两方面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国际援助在福利层面是有效的，能够提高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家庭福利，并对其他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特别地，国际援助为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具体而言，国际援助能够提高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家庭福利，为受援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援助对私人部门的影响问题来看，Asongu et al. (2016)^③ 验证了对外援助的工具性效用。他们的研究证明以财政政策机制为中间传导机制，对外援助有刺激私人投资与帮助固定资产形成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拓展了巴罗 (Barro) 模型建立了内生性增长模型，假定援助的正面效用减轻了受援国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并最终促进了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援助金额较大并且公共部门效率低下时。在实证部分中，作者选用 1996—2010 年 53 个非洲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这在分析对象的选择上也扩大了范围。

^① Larsen, N. (2016). Nonlinearity in the efficacy of foreign aid and evidence of poverty traps.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50 (3), 69–92.

^② 熊青龙 (2016): “从福利角度看国际援助的经济效应——基于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经纬》，第 3 期，第 66–71 页。

^③ Asongu, S. & Jellal, M. (2016). Foreign Aid Fiscal Policy: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58, 279–314.

Haseeb et al. (2016)^① 将 1990—2014 年间作为研究对象的 39 个国家分为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考察国外汇款、对外援助、债务、人力资本、通货膨胀和收入对一国减贫的影响。作者选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发现外国汇款对减贫有促进作用,在统计上仅对中高收入国家显著。而对外援助会加剧贫困。该研究显示,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对外援助是减除贫困的有效手段。因此,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理性对待对外援助,采取政策减少对对外援助的依赖,通过鼓励汇款流入解决贫困问题。应鼓励汇款进入生产性环节善加利用,而非仅用于保持减贫的消费。

Aworinde et al. (2016)^② 研究了对外援助与政府支出的相互关系。通过收集 1970—2012 年 65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相关数据,结果表明,外来援助会在长期扩大政府支出。从援助效果来看,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方面,援助国应确保援助款项资金专款专用,并且应用于资本发展领域,而非政府日常开销领域。另一方面,受援国政府也应逐步降低对外来援助的依赖,通过立法等手段保证援助款项的落实和效用。

Brazys (2016)^③ 通过研究发现,援助与治理的关系中存在着“援助依赖”的拉弗曲线效应,也就是说过度的援助无助于改进治理。他通过选用二次回归 (quadratic regression),证明长期援助的平均水平对治理和近期援助对近期治理水平的影响都存在拉弗曲线效应。这说明过于充足的官方发展援助对治理成的负面影响及存在负边际效应和总体影响。这一研究支持了以往认为援助与增长之间存在负二次方关系。在援助与治理体系的关系是多重因果关系,并不由单一变量决定。在治理的问题上,援助国的援助动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选民情绪的影响,援助国的财政约束也越来越多,所以将会格外重视援助最终带来的效果。根据 Brazys 的研究,援助在达到“拐点”极值后,再持续增加援助的边际效果递减,有时甚至为负。

从援助有效性来说,援助国希望通过将援助外包给非国家开发机构,以避免受援国内部的腐败与国家制度低效。而其他援助政府则继续通过选择受援国国家管理的方式,加强受援国自身能力建设。Dietrich (2016)^④ 发现,援助国的援助方式取决于该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角色。强调市场效率溢出效应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瑞典,对治理不当的受援国会选择外包方式。那些政治经济更强调强大国家提供服务的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将会继续通过国家的方式提供援助。为了理解援助国对外援助的提供方式,必须从该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动态入手详加考察。在研究方法上选用了混合时间序列面板援助分配数据与高级对外援助官员跨国样本的个人访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理解各国不同援助政策、理解援助国国内政治经济的一种新研究方法。

除了研究援助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外,援助如何提高受援国的福利水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① Azam, M., Haseeb, M. & Samsudin, S. (2016). The Impact of Foreign Remittance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Global Evidenc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9 (1), 264—281.

② Aworinde, O. A. & Onakoya, A. B. (2016).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 Expansion: Evidence from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50 (3), Summer, 21—33.

③ Brazys, S. (2016). Aid and Governance: Negative Returns?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8 (2), 294—313.

④ Dietrich, S. (2016). Donor Political Economies and the Pursuit of Aid Effective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1), 65—102.

其中有关数据的缺失会导致整个研究结果偏差。Breitwieser et al (2016)^① 运用多重填补技术 (Multiple Imputation Techniques) 提高了对外援助福利效果评估的准确性。作者选用学校教育、医疗保险和交通设施三个指标代表人的福利水平——如果恶化将加剧收入贫困。多重填补技术解决了数据缺失的问题, 将缺失的观察值重新带入分析中, 解决估计值内在不确定性问题, 增加了分析中的观察值, 并尽可能降低数据偏差。通过 Breitwieser 的研究展示出在援助效果研究中, 福利指标选取的重要性。由于数据缺失带来的样本选取偏差可能会改变回归结果, 在该研究中, 弥补缺失数据后, 实际的援助有效性是下降的。即使数据偏差得以纠正, 在福利指标选取上的差异也会导致最终援助效果的不同。例如, 虽然总入学率和小学生/教室比率指标都可以被选取代表教育水平高低, 但对外援助对上述两个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

李安山 (2016)^② 回顾了中非合作中的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中非合作中存在着技术援助、技术合作、知识转移或者知识共享等多种方式, 均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着非洲国家的发展。改革开放前, 技术转移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三点。(1) 中国政府是主要的技术转移组织者和协调者。(2) 技术转移是伴随着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发生的。(3) 技术转移被视作“政治任务”, 即使载体是民营企业或机构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 中国对非技术转移中民营企业的参与更多, 技术转移成为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手段。技术转移成为提高当地人对中企接受程度的措施, 企业为当地社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更进一步地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这段时期可以被归类为带有政治义务的经济措施。

韩冬临 (2016)^③ 对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对非援助进行了研究。在采用非洲民主动态调查 2010 年数据、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数据后, 构建了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 (2000 - 2010)。研究发现, 非洲公众对中国对非援助效果的评价非常正面。其中, 受援方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对中国的援助评价越正面。中国援助规模以及援助领域并不是影响公众评价的影响因素。此外在微观层面上, 年龄、男性、教育水平、黑色人种、媒体消费与援助评价是正相关关系。根据该研究的结论, 未来中国对非开展援助项目时, 仅仅扩大援助规模并不够,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非洲民生项目的支持力度。此外, 加大对外宣传, 在国际场合“讲好中国故事”也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获得非洲人民肯定的重要方式。

董艳 (2016)^④ 等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 GMM 估计和分位数回归方法, 考察中国对非援助与对其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市场、资源、人口、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后, 不同援助类型下, 中国对非援助与投资的关系出现了不同趋势。投向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会加速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 投向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先升后降; 投向东道国生产性部门和政府的援助与中国对非投资的影响先降后升。根据这一研究结论, 中国利用援助促进对非投资应做到有的放矢。在初期, 可以通过加大对非洲社会基础设施的

① Breitwieser, A. & Wick, K. (2016). What We Miss by Missing Data: Aid Effectiveness Revisited. *World Development*, 78, 554 - 571.

② 李安山、贾丁 (2016): “从坦赞铁路到蒙内铁路: 中非合作中的技术转移”,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第 4 期, 第 171 - 187 页。

③ 韩冬临、黄臻尔 (2016): “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的对非援助”,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6 期, 第 134 - 154 页。

④ 董艳、樊此君 (2016): “援助会促进投资吗——基于中国对非洲援助及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3 期, 第 59 - 69 页。

援助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素质。通过援助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基础的经济设施,为对非投资奠定物质基础。从中长期看,援助应更多地投入到生产型部门的技术改造、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合作关系方面。因此,对中国政府和投资者而言,进行对非援助与投资时,应进行精准设定,选择适当的时期以及正确援助对象以合理水平实现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双赢。

探索和理论上解释当代发展合作的挑战需要一个不断增长的概念工具箱。因此,研究发展合作的跨学科性质应进一步扩展理论基础。Fejerskov (2016)^①认为,由于分析性,概念性和理论力的提高,其中一个突出观点就是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发展合作研究一样,变革的观念处于制度思想的核心位置。他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思想的核心思想为探索 and 解释当代发展合作关注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概念和理论词汇。它在目前的发展合作研究中确定了四大类中央关注的问题,并将其与四种社会学制度研究途径联系起来,为我们提供理论和概念框架,供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推断。这四大关注问题如下。(1) 发展中新参与者的组织领域。(2) 发展中各种观念的翻译和传播。(3) 用制度逻辑来研究主流的发展观。(4) 运用体制和企业家精神来理解该领域制度的形态和组织变革。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日益关注,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合作的研究,也可以让我们增强当代制度思维。

王玉萍 (2016)^② 则从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 的对外援助评估体系入手,回顾了其发展变化的具体历程。发展援助委员会作为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核心机构之一,先后颁布了《发展援助评估原则》、《发展援助评估准则》和《发展评估的质量标准》等相关评估准则,构建出相对完善的对外援助评估体系。虽然中国具有 60 多年的对外援助历史,但目前在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发展援助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为中国提供了借鉴。中国在构建对外援助评估体系初期,不应求大而全,基础性和前瞻性应是两个主要依据。中国并非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应始终依据本国对外援助实践,实现“援助有效性”和“发展有效性”的双重目标。

从国别援助案例的研究评述上,陈松涛 (2016)^③ 评估了孟加拉国近年来的外部发展援助效果。主要评价依据是“巴黎宣言”的五项指标,即自主性、联系、协调、成效管理和相互问责。作者研究发现,外来援助已成为该国外汇储备、国内投资的重要来源,同时在弥补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动员国内资源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实际分配上,外来援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成果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分配并不均等,真正受益者更倾向富有阶层,并未触及到构成该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穷人,拉大了分配的不平等。

(二) 通过援助促进受援国政策改进 (Aid for Policy)

对外援助能被用来改进亚洲地区民主制度吗?关于对外经济援助是否能够改善一国的社会和政治权利,Cassese (2016)^④ 以智利为例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在智利的违反人权

^① Fejerskov, A. M. (2016).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change: how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can inform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2, 2176 - 2191.

^② 王玉萍 (2016): “DAC 对外援助评估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6 期,第 118 - 125 页。

^③ 陈松涛 (2016): “孟加拉国的外来发展援助”,《印度洋经济体研究》,第 4 期,第 80 - 99 页。

^④ Cassese, A. (2016). Foreign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Respect for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ile-A Case Study.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0, 647 - 658.

情况与经济援助有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外来经济援助帮助巩固了现有政权,如果这个政权的现有政策违反了人权的内容,这会加剧人权不平等。第二,为了争取外来经济援助,一国政府需要让自身经济指标呈现出“健康”态势,使得该国值得援助。但是这种努力往往不利于改善该国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Cassese 进一步得出了更为极端的结论,即当地政府的镇压行为鼓励了投资,这两者甚至构成了因果关系的闭环。

Chen et al. (2016)^① 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民众支持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国民众支持对外援助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身份的认同。还有一些群体的人口特点,如年龄、性别和收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收入较低的西部省份以及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省份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支持率较低。针对这一结果,政府应采取不同措施提高民众支持度。

对于援助国如何分配对外援助金额,Ohtsuki (2016)^② 经过研究发现通常援助国将受援国和具体优惠相搭配。Ohtsuki 建立了一个正式模型显示,援助鼓励那些更具民主性的受援国参与成本较高的国际集体行动,并提供跨国公共产品。援助国想要取得什么样的政策让步,决定了它将援助分配给谁。从这个意义上看,援助国以援助为手段目的是促进跨国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并非为受援国国内提供公共产品。例如,美国在分配对外援助时,会根据受援国的承诺程度,选择更民主的国家参与跨国集体行动,而对于独裁政府,美国更倾向于积极提供资金换取这些国家在联大投票的支持。

对外援助能否被用来促进亚洲民主?在独裁型受援国中推进自由化通常代价高昂,并且抵制援助国要求推进改革的压力。对于拥有援助国欣赏的战略和商业特征的国家,应该更容易得到援助支持,并抵制来自援助国要求自由化的要求。与此相反,对那些战略上和商业上没有吸引力的国家,则不能有效地抵制这种压力。相比之下“二等”受援国更容易被推动进行进行政治自由化改革。Tan (2016)^③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五、总结

国际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发展问题,但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单独存在。对外援助作为支援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手段之一,体现了不同援助国对发展问题的理念和阐释。总的来看,发展援助文献数量2016年较大幅度增加。本文主要从对外援助的动机、运行机制和效果评估三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对外援助是根据各国外交实践而不断出现新变化的应用性学科,2016年并没出现有关发展援助的理论性突破和创新,这与发展理论本身尚待突破有密切关联。从总体来看,对援助动机的考察、援助运行机制的剖析和对援助效应的衡量,都体现出学术界为国际援助体系提供新知和公共知识产品的努力。目前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之一,是建立中国独立的对外援助机构。在学科研究新亮点上,三方合作模式的重要性在对外援助中不断凸显,成为传统援助国、新兴援助国、受援国合作的最新模式,可为中国借鉴。此外,援助国如何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援助,发达国家的实践给新兴援助国很多重要启示。以美国为例,在选

^① Cheng, Z. & Smyth, R. (2016). Why Give It Away When You Need it Yourself? Understanding Public Support for Foreign Aid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2 (1), 53 - 71.

^② Ohtsuki, K. (2016). Buying the Best Favor: Foreign Aid for Cooperation or Conven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6, 175 - 208.

^③ Tan, B. S. (2016). Aid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Asia,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1 (2), 152 - 170.

择海外援助性非政府组织上,美国更偏向于选择本土非政府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在意识形态、援助理念、援助手段上更为与自己接近。另外,在援助效果上学者们考察了多维度考察指标,并逐一进行了验证,为各国在实践中考察援助效果提供了思路。

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方面,对外援助的研究应建立在可靠实证研究基础上。另一方面,对对外援助的研究离不开内容翔实的田野叙述,两者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基础性的参考数据。在88篇文献中,有接近半数的研究采用具体案例分析方法。援助的动机和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对援助效应的考察则主要基于数据分析和模型假设。

在发展研究方面,总结国际上有实践价值的经验,同时归纳中国经验上升到理论模型的研究依然缺乏。在对外援助领域,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在援助理念、援助措施以及援助效果的认定和评价标准不尽相同,在可预见的未来差异会越来越大。西方学者研究的援助体系中仍然以“良治”为核心,希望通过对外援助推动受援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及政治民主化改革。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中国,援助的前提和出发点是不附加政治条件。中国学者关注对外援助问题,是出于自身发展目标。例如,2016年出现了一批对美国、日本以及欧盟援助历史的回顾,这主要是出于经验借鉴的目的。

发展经济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敏感性,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影响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走向。南北两套对外援助的体系能否在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基础上更好地融合,将成为理论界关注的新议题。